



中国近代哲学简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哲学简史

张 锡 勤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朱德环
靳瑞华

中国近代哲学简史

张锡勤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8 · 字数 160,000

1980年2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38,001—45,000

统一书号：2093·14

定价：0.65 元

目 录

第一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想.....	(1)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斗争	(1)
一、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社会	(1)
二、鸦片战争前后的思想斗争	(4)
第二节 龚自珍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	(8)
一、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及其社会经济改革方案。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	(9)
二、龚自珍的哲学思想	(14)
第三节 魏源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	(18)
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19)
二、魏源的哲学思想	(24)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农民革命思想与封建反动思想的对立	(31)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思想斗争	(31)
一、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和失败	(31)
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思想斗争	(33)
第二节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	(37)
一、宗教外衣下的反封建思想	(37)
二、《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49)
三、《资政新篇》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	(53)

第三节 曾国藩的反动政治主张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57)
一、反动、虚伪的“诚”字哲学	(59)
二、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政治主张	(63)
第三章 戊戌维新时期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想	(68)
第一节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兴起。戊戌维新运动和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斗争	(68)
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	(68)
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高涨和戊戌维新运动	(75)
三、资产阶级改良派同封建顽固派、洋务派的大论战	(78)
第二节 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	(83)
一、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及其“托古改制”的手法	(84)
二、庸俗进化论的思想	(90)
三、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	(95)
四、“求乐免苦”的人性论和伦理观	(100)
五、关于“大同”的空想	(103)
第三节 梁启超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	(109)
一、主张“今胜于古，后胜于今”的进化史观	(110)
二、关于“兴民权”、“开民智”的主张	(114)
第四节 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	(117)
一、要求“冲决网罗”的反封建思想	(119)
二、对资本主义的向往和对帝国主义的矛盾态度	(125)
三、谭嗣同早期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及其	

向唯心主义的转变	(128)
四、《仁学》的唯心主义实质	(133)
五、变化日新思想及其相对主义、形而上学 的归宿	(138)
六、建立在相对主义基础之上的不可知论	(142)
第五节 严复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	(145)
一、强调“自强保种”、“与天争胜”的进化论思想	(147)
二、自然观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	(153)
三、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批判及其不可知论	(155)
四、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及其“鼓民力， 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	(160)
第四章 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思潮和哲学 思想	(166)
第一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二十世纪 初思想领域的尖锐斗争	(166)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和民主革命思潮的 兴起。邹容、陈天华的民主革命思想	(166)
二、梁启超的“新民论”、主观唯心论和 英雄史观	(172)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改良派的大论战	(179)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孔孟之道、封建礼教 以及有神论、天命论的批判	(185)
第二节 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	(191)
一、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政治纲领 ——三民主义	(193)
二、二元论的宇宙观	(200)
三、“知难行易”的认识论	(204)

四、唯心主义的民生史观	(211)
第三节 章太炎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	(216)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218)
二、以《噫书》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	(225)
三、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转变。对有神论的 批判及其“自贵其心，不依他力”的主观唯心 主义哲学	(231)
第四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 国传播。中国哲学史上的新时代的到来	(239)
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李大钊、陈独秀对唯心 论、有神论的批判	(239)
二、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哲学史上 的新时代的到来	(248)

第一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想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斗争

一、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社会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前，中国虽然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依然停留在封建社会。在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剥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是当时主要的生产关系。农民同地主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统治中国的清朝政府从嘉庆年间（1796——1820年）以来，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支绌，逐渐走上了下坡路。整个封建统治百孔千疮，江河日下。当时，官吏贪污成风，赋税日益苛重。地租剥削率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高利贷剥削极为猖獗。由于封建剥削日益沉重，封建经济日趋凋敝。在官僚、地主的掠夺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早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有的官僚就曾指出：“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

乾隆以后，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大量农民破产流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一七九六年终于爆发了持续九年、波及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接着，一八一三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其中一支农民起义军还杀进了北京皇宫。苗、瑶、回各族人民也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在农民革命斗争的打击下，清朝的封建统治已经开始动摇。

正当清朝统治日益衰弱、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侵入亚洲。当时，头号资本主义侵略者是英国，其次是法国、美国和沙皇俄国等。英国早就向中国进行商品输出，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但是，中国的自然经济对西方工业品的侵入，有着顽强的抵抗力。清朝限制对外通商的闭关政策也起着保护封建经济的作用。于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侵略者便决定以毒品鸦片来打开中国的大门。

从十九世纪初年开始，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不断增加。鸦片“毒中国之人而又竭中国之财”（黄爵滋：《敬陈六事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严重危害。烟毒泛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怒和强烈反对。在统治阶级中，以林则徐^①为首的一派，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也主张严禁鸦片。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1821—1850年在位）的奏折中说：鸦片“流毒天下”，“为害甚钜，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钱票无甚关碍宜

①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人。

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道光鉴于“兵弱银荒”的危机,委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中国严厉禁烟沉重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利益。英国资产阶级决计用战争来保护可耻的鸦片走私,以武力来打开中国的大门。一八四〇年六月,英国挑起鸦片战争。战争打响以后,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官吏在人民的支持下,对英国侵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东南沿海人民纷纷自发组织起来,到处打击侵略者。一八四一年五月三十日,广州郊区三元里一带人民数千人将英国侵略军团团包围,杀得侵略者“乞命之声震山谷”(梁廷枬:《夷氛闻记》),充分表现了作为反侵略战争主体的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精神。但是,清朝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却被英国侵略军的凶焰吓倒,日益主张妥协。战争开始后不久,他就将林则徐革职,先后委派琦善、奕山、奕经等投降派主持对英的战事和交涉。这伙反动派们“防民甚于防寇”,大敌当前,他们不是依靠人民去抵抗外国侵略,而是继续坚持反人民的反动政策,镇压和破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结果,清军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溃败。一八四二年八月,清朝政府屈辱投降,同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点。战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变化。政治上,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开始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经济上,由于中国的门户被迫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

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使中国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从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原来农民同地主的矛盾外，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的矛盾。而且，随着外国侵略的深入，这一矛盾又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样，落在中国人民肩上的就不单是反封建的任务，而是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了。中国近代的思想斗争、哲学斗争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

二、鸦片战争前后的思想斗争

鸦片战争前，在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宋学”和“汉学”。

所谓“宋学”，就是产生于宋代的“理学”，宋元以来，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官方哲学。理学流传至清，虽已日趋衰微，但它始终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是清朝统治者统治人民思想的主要工具。

清朝统一中国后，为巩固、加强满洲贵族的统治，比以往历代统治者更加强化了对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统治。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沿袭明代八股取士制度，笼络地主知识分子，一方面又多次大兴“文字狱”，以极端残酷的手段镇压、取缔反清思想。在这种文化高压政策下，一部分知识分子鉴于“文网”太密，因而不敢去触及那些与现实有关的问题，便埋头于对古代经史典籍进行注疏、辨伪、校勘、辑佚的工作。这一学派在乾隆、嘉庆年间最为盛行，故称“乾嘉考据学”，又

因为这一派继承东汉诸儒的考据训诂之学，故又称“汉学”。汉学家们在整理、考订中国古典文献工作上，在文字学、音韵学上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不问世事，终日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结果在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种脱离实际，逃避斗争，知古不知今的坏风气。因为这种学风有利于封建统治，因此汉学也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在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下，在宋学和汉学的统治下，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思想界是一片“万马齐喑”的沉寂空气。

然而，鸦片战争前后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以及人民群众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不能不在思想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社会急剧动荡和变化的过程中，逐渐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僚、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危机惶恐不安，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深为忧虑，因而要求改革弊政，抵抗侵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是这一派人物的代表。

这一派反对宋学、汉学空谈“性理”，脱离实际，厚古薄今，舍本逐末的学风。他们主张“经世致用”，面对社会现实，解决实际问题。为了给自己的改革主张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利用“今文经”作为议论时政的工具。儒家经学的今、古文经之争始于西汉，由来已久。西汉时，曾发现了一些儒家经籍的古本，这些新发现的古本是用秦以前的六国古文书写的，故称“古文经”。而那些一直流传的、用当时通行的文字书写的儒家经籍则称之为“今文经”。由此产生了今、古文经学两大派。在西汉，今文经学派和谶纬神学相结合，任意牵强附会地解释经书内容，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是当时的正统学派。古文经学派则偏重对经书的训诂考释，因而不为当时统治者所重视。但自东汉、魏晋以后，古文经学影响渐大，而今文经学则日见衰微。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了呼吁变革，打破当时思想界冷落、沉寂的局面，便利用今文经学派不拘泥经书词句、借题发挥的特点，以阐发今文经“微言大义”的手法来议论时政，于是今文经学又重新复兴。后来，在戊戌维新时期，康、梁同样是以今文经学为工具来宣传他们的变法维新主张的。在儒家定于一尊的时代里，龚、魏、康、梁采取这一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一派的思想主张，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和顽固守旧派以及那些迂腐士人讴歌“盛世”、粉饰太平的论调相反，他们敢于面对现实，承认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危机，对清朝的腐朽统治极为不满，提出了变革的要求。他们指出，当时的封建社会，吏治腐败，百弊丛生，武备废弛，刑赏失措，剥削过重，生产荒废，整个统治机构已经瘫痪不灵。有人更直接指出，当时的清朝已进入“衰世”，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为了挽救封建社会的危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虽然，他们只是要求在封建制度的框框内搞些兴利除弊的措施，没有触及封建制度本身，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揭了封建制度的疮疤，暴露了它的腐朽，这就在客观上动摇了封建统治。

第二，和顽固守旧派平日以“天朝”自居，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而临事又惊慌失措，对外妥协投降的态度相反，他们一方面主张抵抗外国侵略，一方面又反对那种一味虚骄，

盲目自大的愚蠢态度。

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他们主张坚决抵抗。因为受到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鼓舞，他们又相信“民心可用”，主张一定程度组织和依靠人民来抗击外国侵略者。这和投降派“防民甚于防寇”，最终对外屈膝投降的反动立场形成了鲜明对照。

他们十分痛恨顽固派、投降派“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而“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的态度（姚莹：《复光律原书》）。为了“筹制夷之策”，“雪中国之耻”，他们主张了解外国，并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之道。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期间，便“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努力了解西方。后来，魏源又进一步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希望能“尽变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增强抵御外侮的能力。毛主席曾经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58页）林则徐、魏源等就是近代第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看西方的先进中国人。

要不要改革弊政？要不要了解外国，学习西方，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这是鸦片战争时期思想领域斗争的主要问题。这一斗争表现在哲学上，主要是变与不变的斗争。当时，顽固派们反对任何变革，而龚自珍、魏源等人则继承并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变易”思想，宣传发展变化的观点，与之相对抗。他们宣传“气化无一息不变者”的观点，是为了证明“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他们主张今胜于古，是为了通过

“变古”以“便民”。他们提倡变易思想，是为他们政治上的改革要求服务的。但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突破封建制度的框子来讲变革，因此，他们在哲学上虽然一方面大谈变易，而另一方面却又认为“道”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他们最终并未跳出形而上学的窠臼。在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方面，龚、魏也曾对程朱理学和古代的其他唯心主义观点作了一定的批判，表现了他们的哲学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

龚自珍、魏源都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分子，他们同顽固派、投降派的斗争只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是，他们能以敏锐的洞察力，提出了许多高人一等的卓见，这是十分可贵的。他们的思想曾对以后的许多先进思想家产生过重要影响。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龚、魏是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者。

第二节 龚自珍的政治思想 和哲学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年），字璩（sè 音色）人，号定盦（ān 音安），一名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中进士后曾任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等小官，同当时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林则徐、魏源是志同道合的挚友。他始终未曾受到封建朝廷的重用，最后终于辞官回家。一八四一年春，他受聘主讲于江苏丹阳的云阳书院，不久病故。

龚自珍在青年时代就鄙薄汉学考据，主张“经世致用”。

从“通经致用”的目的出发，他曾从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公羊春秋》^①，学习了便于引伸发挥的今文经学。然而，龚自珍并不是一个主张“皓首穷经”的经学家。他为学“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魏源：《定盦文录叙》），比较注重实际，因此他就能对他所生活的那个动荡变化的时代有一定的认识。为了挽救封建社会的危机，探求本阶级的出路，他写了一系列尖锐、犀利的政论文，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黑暗作了一定揭露，并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他那些“讥切时政”的大胆议论，在当时曾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和反响。他在他著名的《己亥杂诗》中，曾称自己“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确，龚自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开了议论时政、要求革新的风气，这一历史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梁启超后来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清代学术概论》）这个说法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一、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及其社会经济改革方案。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

龚自珍尖锐指出，当时的封建社会虽然还维持着表面的、虚假的“太平”，但实际上已进入了“日之将夕”的“昏时”、“乱亦竟不远”的“衰世”，它如同“将萎之华（花）”（《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见《龚自珍全集》。下引龚自珍著作均见该书，不再注明），已经走上了衰败的道路。

^① 刘逢禄（1776—1829年），字申受，江苏武进人。《春秋》三传中《左传》为古文经，《公羊传》和《穀梁传》为今文经。

龚自珍揭露说，当时的官场是，“官益久，则气愈媮（同媮，苟且）；望（资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明良论二》）那些“政要之官”，只“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同上）封建官僚们一味谄媚固宠，因循苟且，奢侈享乐，大多是些寡廉鲜耻、庸碌无能、无所作为的家伙，结果就造成了政治的腐败和黑暗。他又揭露说，由于封建剥削残酷，加之封建统治者长期来“不论盐铁不筹河”（《己亥杂诗》），不问生产，结果“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西北置行省议》），广大农民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下去了。他认为，当时“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同上）危机已经十分严重。

龚自珍预言，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必将有反清的力量兴起。他在《尊隐》一文中，以“京师”喻朝廷，以“山中”喻在野的反清势力，以隐喻的手法分析了朝野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京师贫，则四山实矣”，“京师之气泄，则府于野矣”，“豪杰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京师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最后，“山中之民”必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在封建统治者醉生梦死，自欺欺人，竭力粉饰太平的时代，龚自珍敢于言人之所不敢言，用他的笔戳破了这只纸老虎的皮，在当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但是，龚自珍揭发矛盾，暴露危机，并不是为了鼓吹革命，而是为了以此来警告、敦促清朝统治者赶快变法，以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他向清朝统治者尖锐提出：“一祖之法无